

第一章

绪论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

——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

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

——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

吾更欲有一言，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遽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他留学欧美之学僮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第一节 什么是国学

一、国学的概念

“国学”最早的确切含义是指国家一级的贵族学校。西周时期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设在周王朝都城和诸侯国都城的学校为国学，是大贵族子弟的学校，各地所设的学校为乡学，是一般贵族子弟的学校。《礼记·学记》有“古之教者，家有



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的记载。这里的“国”即“天子所都及诸侯国中也”；老师是乐师，“掌国学之教，以教国子小舞”（《周礼·春官》）。《大戴礼·保傅篇》也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8岁学小艺，包括认字、读书以及学习日常行为规则，如早出报、晚归告等；到15岁束发时，开始学习大学之道，即“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这样，小学与大学相结合构成的“国学”，保证了士人不仅能通过读书增长见识，还能不断提高品德修养，达到完善的境地。

后来，“国学”泛指“京师官学”，主要是太学和国子学。从西汉开始，历朝政府不断完善各级学校设置，普遍设立太学，如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年），太仆朱浮认为“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后汉书·朱浮传》），建议立太学、选博士，以振学术。汉末刻写石经立于太学门口，太学便成为国家学术的重要象征。在隋代，太学被称为“国子监”，唐、宋时，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元代设国子学，明、清两代设国子监，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设学部，国子监的称呼才被废止。可见，从周朝开始，“国学”主要是指以太学为代表的国立学校，并不指学术，但

这些学术机构培养出来的人才，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和演进。

到19世纪末，“国学”一词仍沿袭“国立学校”这一含义。康有为于1886年撰写的《教学通义·国学》便有：“至于国学，自天子、世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教之。其学虽有末廩、上庠、东序、成均、瞽宗、大学之异，其地虽有公宫、国内、四邻之殊，然《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亦犹教万民之德行道艺耳。”（《康有为全集》）他在《教学通义·大学》中又说：“大学者，国学之大者也。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而国学有二：有大学，有小学。其地，则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其教之之人，则小学以师氏、保氏掌之。大学则大司乐以乐德、乐语教国子。所教之人，小学则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大学则天子之元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乡学之俊秀学。小学与大学俱教国子，但小学无俊秀，与大学异。”（《康有为全集》）

晚清以降，“国学”被赋予了中国固有之学术的新含义，其内涵与古代“国学”概念大不相同。有学者认为这一新含义来源于日本。江户与明治时代的日本学者为抵制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传统儒学与佛学，主张将学术全面转向对日本古典文献和固有文化的研究与发扬，他们自称这个时期的日本古典文化研究为“国学”。“国学”一词为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人所借用后，才转而特指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研究。1902年秋，梁启超与黄遵宪等人拟在日本创办《国学报》。1904年，邓实发表的《国学保存论》（见《政艺通报》）论述了保存国学的重要性。1905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该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见《国学保存会简章》，《国粹学报》第2卷第1号），邓实在《国粹学报》上指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

通



识



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者也，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邓实《国学讲习记》）

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提倡反清革命和研究国学，留日青年成立国学讲习会，请他讲授国学。1922年4月至6月，章太炎在上海讲“国学大概”、“国学派别”。1934年，章太炎在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对国学作了总结性的讲解。章太炎这几次演讲经过记录整理成《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等书。在章太炎那里，“国学”主要是指研究中国古代正统高雅文化的学术活动，它有时还与“国粹”混淆在一起。此外，胡适、吴宓、钱穆等人也对“国学”各有论述，如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初，曾如此诠释“国学”：“‘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胡适文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在“整理国故”的口号下重新界定“国学”，将“国学”定义为“国故学”，它仍然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术的总称。吴宓也曾解释说：“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他认为国学不仅包括传统的全部学术，还应包含出土文物、民间的资料以及海外汉学。蔡尚思在1931年出版的《中国学术大纲》中将国学界定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不难看出，“国学”这个概念是在中西文化相接触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很自然地会产生两种不同的文化选择：其一是坚持固有的中国文化传统；其二是了解、认识、输入西方文化，革新中国文化。不论在哪个派别那里，都基本认同“国学”是指中国固有学术这一含义。

20世纪90年代，张岱年在《国学丛书》序言中指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包括哲学、经学、文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宗教、艺术等，其中，自然科学又包括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该定义受到西方学科分类思想的影响，不仅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还包括自然科学，外延较20世纪初已大为拓宽。另外，学者还主张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国学范畴，随着历史与文化的不断积淀，国学除了包括国故学之外，还应该包括原是外域之学而后逐渐被中华民族所消化、吸收、认同或再创造的那部分文化。

2005年，王富仁提出“新国学”的概念，指出近百年中国文化和中国学术是在“五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学不应该局限于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而应理解为广义的传统文化，即周秦至清末以来中国社会整体的价值系统和生活方式。在此意义上，中国人天人关系中的“天人合一”、人伦关系中的家国同构、自我态度中的价值自觉、生死世界的不即不离，它们作为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的核心，是国学的研究内容；中国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乃至生活方式，也是国学的应有之义。“新国学”是由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两个因素构成的学术整体。从民族语言的角度看，“新国学”包括中国内地学者、海外华人、台港澳等地区的中国学者在内的所有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和现在刚刚出版的用汉语言文字写成的学术研究成果；从“国家”这个构成性因素看，中华民族内部的各少数民族成员用汉语或用本民族的语言对本民族文化或汉语言文化进行的

所有研究，也在“国学”的范围。“国学”在我们的民族语言和我们的民族国家产生之时即随之产生，并无间断地发展至今，只要我们的民族语言和民族国家还存在并发展着，我们的“国学”内涵也永远处在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

二、国学的分类

国学的分类可溯源至汉代的刘歆，他整理皇家秘书，分群书为“六略”，冠以“辑略”之名，又叫“七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艺略为经部，包括《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子略是哲学政治学，诗赋略是文学，兵书略是军事学，术数略是天文历法，方技略是医学。

至三国魏时，荀勖作《中经薄》，分甲、乙、丙、丁四部。晋李充重分四部，增加了史部，这样，甲部便包括六艺、小学，乙部包括诸子、兵书、术数，丙部包括史记及其他记载，丁部包括诗赋图赞。到《隋书·经籍志》，四部才开始以经、史、子、集命名，此后多以此为纲，清代《四库全书》就是以此分类的典型。“经”是指我国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史”是指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子”是指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著作，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集”是指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等的文集和文学评论、戏曲等著作，分为楚辞、别集、诗文评、诗、词五类。

清代姚鼐从学术史角度，将国学分为包括经学、史学、玄学、佛学、理学的义理之学，包括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目录学、校勘学、考古学的考据之学，包括文学艺术的辞章之学。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增添了经世之学，即经济之学，内容包括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兵学、政学、历算学、博物学及自然科学等。

在章太炎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小学、子学是经学的附庸，经学地位独高。章太炎发扬“六经皆史”的观点，把经学与诸子学同等看待；把注解诸子的字词训诂发展为“义理之学”，强调诸子学的发展源流和思想传承；把国学分小学、经学、史学、子学、文学五部分，各自没有等级上下的差别。胡适在继承章太炎等人的观点上，提出一个国学系统：“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一个系统，中国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国学季刊〉发刊宣言》）1925年吴宓主持清华国学学院，把国学扩大为不但包括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文领域，而且包括自然与科学领域以及外国学人研究汉学的成果。

国学作为一门学问产生于“西学东渐”之时，从狭义上讲，国学就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及其研究的学问；从广义上讲，国学则包含了传统节日、中医、京剧戏曲、中国功夫等内容。本书所说的国学，是从其狭义的概念上去探讨的。

